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芦

恒



著

东亚公共性重建 与社会发展

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

The Rebuilding of Public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Based o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东亚公共性重建 与社会发展

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

The Rebuilding of Public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Based o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芦

恒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公共性重建与社会发展：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 / 芦恒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8937 - 7

I. ①东… II. ①芦… III. ①社会发展 - 研究 - 东亚
IV. ①D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490 号

·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

东亚公共性重建与社会发展：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

著 者 / 芦 恒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周 丽 颜林柯

责任编辑 / 颜林柯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75 字 数：31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937 - 7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芦恒副教授的著作《东亚公共性重建与社会发展：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一书可谓深层次的理论反思与丰富历史经验兼而有之的富有学术雄心的研究成果。该书分为三大部分，共15章。作者首先在导言中梳理公共性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一部分阐述和反思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公共性危机及其社会后果。第二部分揭示韩国学术界就公共性危机的克服之道展开的争论和社会实践。第三部分揭示韩国的公共性危机对同样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启示，选取城市贫困阶层、地域再开发、房地产与住宅、农村发展、青年失业、老年流动群体等社会问题，将韩国与中国的经验进行比较。该书的研究素材丰富多样且引人入胜，是社会学、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社会变迁等领域的学者值得一读的著作，特别是同样以公共性角度探索东亚现实与未来的学者和学生必读的作品。

通读该书可发现，其魅力在于作者着力于从内部洞察东亚发展经验，探寻社会发展模式，集中体现在其提出的“作为方法的韩国”或“作为视角的韩国”。此概念具有强烈的东亚认同和问题意识，脱离西方理论的桎梏，运用东亚视野思考东亚本土现实，特别是在东亚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变迁的脉络中进行比较研究，对东亚发展之道有其独特看法，体现出青年学者所具有的历史意识以及自我审视的学术态度。

在为此书撰写序言之际，我想介绍一下与芦恒副教授相识的过程。我于1981年任教于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2006年9月至2007年5月，我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东亚社会发展与现代社会理论”一课。此外，我于2007年夏天还在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课。芦恒当时还是着手撰写博士论文的在读博士生，同时也作为研究助理协助

处理我的授课事宜。我对吉大的授课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学生们学习认真，求知欲强烈，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研究助手的芦恒和我分享了很多想法和学术理想，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城市棚户区、劳动者贫困问题的研究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于2010年2月从首尔大学退休，同时在3月份赴北京作为客座教授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课。5月份收到芦恒的邮件，得知他已经留校任教。几天后，他特意来北京拜访我，其间我们促膝而谈，交流了很多想法。5年后，我邀请芦恒来首尔参加“中民理论3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中民理论”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理论，旨在探索韩国民主化转型时期推动社会变迁的主体性问题。与社会底层推动社会变迁的观点不同的是，我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规模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之中，年轻且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中民”，反对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具有强烈的社会变革诉求。由于激进理论在当时的韩国大学校园内广为盛行，我的研究饱受争议。尽管如此，“中民理论”的正当性在1987年6月的民主化抗争以及7~8月的工人运动中得到验证。在此背景下，我们于2015年9月特别召开“中民理论3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于9月14日在首尔市厅的会议室成功举办，首尔市市长朴元淳，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为此会致辞。此外，年轻学者围绕“中民理论”的论争做了相应的评价和批判。其中，芦恒副教授作为此次会议的海外报告人，全程参加了一天的讨论会，并在最后环节尝试用韩文发言，从中国的角度对“中民理论”做了简单精彩的评析。第二天，首尔大学社会学系邀请他在首尔大学做了关于在中国网络空间迅速传播的“屌丝意识”的专题发言。

此外，芦恒在首尔的这几天与我集中讨论了一些主题，对我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我意识到芦恒的发言不仅是对“中民理论”所进行的合理解读，更是在探究一种将会对中国变迁与公共性研究产生影响的开放性视角。众所周知，公共性问题在东亚文化传统中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自古传承至今的“天下为公”的儒学概念为此提供了深奥的思想和想象力。内嵌其中的“公共性”概念也被分为不同层次。社会科学关注的是围绕“公领域”的两大层面。简言之，一类公领域为“公共”，另一类则为“官公”。前者意为开放的理解沟通或者是形成公共讨论场所的公领域，后

者是国家或官僚机构主导的公领域。前者追求的是“公益”，后者则为“国益”。两者皆为区别于私人领域的公领域，但这两类公领域存在张力和矛盾。

韩国的发展经验即是真实写照。简单回顾言之，朴正熙总统于1972年实行维新体制。昭示于天下的“官僚权威主义国家”借助国际资本，扶持财阀企业走上经济增长的富国强兵之路。20世纪70年代末，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出口行业取得飞跃性发展，防卫产业也得到较大发展。经济增长使国家威信和国家能力在一穷二白的社会中陡然增强，国家利益也随之扩大。然而如影随形的是诸多损害公共性的副作用，且不断深化蔓延。其后果导致民主政治大步后退；人权受到压制；劳动者收入低，其正当权利也无正常渠道加以保障；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地域间发展不平衡程度加重；农村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政商勾结腐败程度加深。鉴于此，社会各界对公共性新方向的关注与日俱增。彰显社会正义、公正性、环境保护、人权、公民参与等价值的社会运动日益蓬勃，以反抗国家倾向的“国益”或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些努力并非“官公性”，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因此，公民社会强调的“公益”和国家主张的“国益”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在所难免。

我在9月14日的中民学术会议上聆听芦恒的发言之后深受鼓舞。原因在于他在“中民理论”的框架内捕捉韩国的公共性历史和现实经验。他认为公共性是基于民主治理理念形成的公共权威，同时公共性也是通过社会沟通维护共同利益的参与性的规范，公共性乃是公共权威之“公”与理解沟通之“共”的均衡状态。进而他论述，韩国的官僚主义理论不仅排斥民众的共同利益和理解沟通，而且通过资本主义原理和民主主义原理的对立关系体现出官僚主义的自我崩溃倾向。听到这些陈述，我深深地被此种能够采用核心概念高度概括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的能力所吸引。此外，我将中民看作建构新型公共性的主体，在此基础上，他还借用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家董仲舒的“中民之性”概念来补充解释中民的特性。为此，我不得不感叹后生可畏，欣赏其人文学教养和创造性思维。

进而言之，芦恒副教授认为韩国的发展经验不能单纯被视为地域研究的对象，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东亚社会的认同性”，在批判反思的

框架内赋予韩国认识论意义，对公共性的转型与重建进行研究。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挑战，同时也是一种雄心勃勃的研究。对于此，我还不能妄加评论。希望以本书出版为契机，期待芦恒副教授结出累累学术之果，同时也期待中国和韩国学者能够围绕社会发展和公共性等领域展开更具生产性的对话和交流。

韩相震

2015年10月30日于韩国首尔大学

20 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东亚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学术界对东亚社会的关注也陡然发生了变化。其突出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从对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日本经济重新崛起、“亚洲四小龙”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奇迹的惊叹，转向对东亚社会深度现代化之后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均衡发展问题的密切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东亚经济社会均衡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换和表述为公共性问题。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社会理论的专用术语，“公共性”是一个充满争论的多义性概念。日本学者斋藤纯一认为，所谓公共性“就是不求‘闭锁性’和‘同质性’的共同性，是抗拒‘排斥’和‘同化’的一种相互连带”。^① 中国学者李明伍则将公共性概括为“某一文化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② 关注公共性研究的学者普遍承认，公共性的存在形态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内，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公共性。因此，在理解探讨东亚公共性问题时，我们应在把握人类文明公共性一般概念的基础上找出东亚公共性的一般特质。

前些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以欧美社会为参照系对东亚公共性的特质展开比较分析，认为东亚公共性具有一些明显的特质。第一，在欧美世界中，自阿伦特、哈贝马斯以来，公共性多是作为政治、社会理论的用词而被使用的，是指作为公共言论的空间，或是形成公论的市民生活领域。

① [日] 斋藤纯一：《公共性——思考のフロンティア》，东京：岩波書店，2000，p. 6。

② 李明伍：《公共性的一般类型及其若干传统模型》，《社会学研究》1997 年第 4 期。

而东亚在理解公共性时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也沿用欧美的原意，但相比之下更强调其实用性，遂导致东亚的公共性概念“往往是作为公共事业等公共权力活动正当化的词汇而被使用的”。^① 第二，就公共性的主体而言，与欧美世界公共性实现主体的多元形态不同，东亚的公共性主要是由“官”“公”来加以承载的。到近代，进而引申为“政府”或“国家”的领域。相比之下，东亚的“公”基本上是由“官”来加以承载的，形成了“官尊民卑”的独特构造。而欧美世界中的“公共性”则主要包括“公民自主性”“公开性”“共同性”“多样性”“讨议”在内的多层面空间，“官”以外的力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三，在西方世界，公共性理论往往强调公民的公共性，主要是主张以个体与公权力相对抗的理论，是一种“对抗的公共性”。但在东亚社会的日常用语中，一般是将与公共权力相关联的事务规定为公共性，在这里，公共性理论实际上是作为赋予政府和行政权力等公权力活动合法性的理论而存在的。而且，市民与公权力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第四，就公共性的纵向演进轨迹而言，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中日两国的公共性形态都非常清晰地依次经过了“古典的公共性”“民族国家的公共性”两个阶段。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两国走向现代化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官”始终扮演了“公共性”承载者的角色。在中国比较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是1949年后建立的“单位社会”。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单位组织。长期以来，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更多的是在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来实现的。而在日本的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则主要体现为“立公灭私”“损私奉公”的过程。“战后，随着‘灭私奉公’神话的崩溃，自我亦即私的利害虽然摆脱了默默无闻的地位，但由于自发结社尚未成为趋向，并未由此产生走向公共性的自主道路。依然由官宪国家代表的公共性，以其慈惠的国库支出和社会保障残留

① [日] 广松涉：《岩波哲学·思想事典》，东京：岩波书店，1998，p.486。

着极强的国家性格。”^①可见，虽然东亚公共性构造各具特色，但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前东亚公共性构造仍具有极大的相同性，表现为东亚威权社会以“官”为主体、以公共事业的实用性为主体的公共体系。东亚的公共性构建实际上是其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公共性与欧美社会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既是由二者本土传统文化的差异所致，同时也是由东亚与欧美社会发展存在的“时间差”所致。

近年来，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各国的学术界开始关注公共性问题的研究，并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其研究分布不甚均衡，尤其是关于东亚公共性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不多，为公共性研究留下了较大的学术空间。在这一意义上，本书的选题具有独特的学术贡献。本书在深度解读公共性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颇具理论价值的研究主题，即在追问“东亚社会的协调发展建基于何种公共性”这一基本问题基础上，将东亚两大重要经济体中国和韩国视为东亚发展研究的重要对象，认为“公共性”与“社会发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皆为共生互促的关系，当代东亚社会转型的逻辑应遵循一种从“对抗性公共性”转换为“均衡性公共性”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均衡性公共性的建构将会成为东亚新发展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也会成为东亚现代性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载体，这具有重要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

芦恒是我较早入门的博士生，他是通过直博方式获取博士学位的优秀学生。记得在本科学习期间，他即阅读了大量韩文资料，撰写了《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市民社会的发展》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主办的《当代亚太》期刊上，较早地表现出突出的学术禀赋，这在本科学习阶段是不多见的。而且，在学习芦恒表现出独特的语言天赋。他在学好英语的同时，通过自学学会了韩语，并取得韩国语语言认证，翻译出版了《善德女王》《房地产阶级社会》等韩文著述，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博士毕业后，芦恒留校任教，一直在做中韩比较研究。经过十年积累撰写成《东亚公共性重建与社会发展：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一书，将源于欧美的公共性概念

^① [日]山口定：《新しい公共性》，东京：有斐閣，2003，p. 14。

及话题加以转换，移植到亚洲视域，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社会学界管窥世界的宽度，同时也为吉林大学社会学学科东亚社会研究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肯定。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可继续深入追问和雕琢之处，如该成果仍需对公共性概念展开复杂的跨文化意义上的解说和界定，并对中韩两国在公共性问题上展开比较研究的可比性问题进行前提界定。有些观点仍需进一步推敲。相信他一定会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治学境界，成长为东亚社会比较研究领域内有突出贡献的佼佼者。

田毅鹏

2015年10月29日于吉林大学东荣大厦

本书围绕“当代东亚社会转型如何影响公共性的变迁”，以及“东亚社会和谐发展配之以何种的公共性基础”等基本问题，选择中国社会学者较少关注的“韩国社会转型及其社会后果”作为研究对象，挖掘其二战后的社会转型背后的公共性变迁逻辑，可作为审视东亚现代化困境及其新选择的重要参考框架，以区别于注重区域经济政治与人文的现有韩国学研究，同时也不同于国内学者习惯将“欧美”与“日本”作为审视中国转型问题的单一样本，将韩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逻辑研究提升为一种把握东亚社会新型发展模式的社会学视角。

本研究认为“公共性”与“社会发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都存在内在的密切联系。公共性自身具有的可视性、开放性、整体性、主体性、互动性、平衡性、生活性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内容、范围、内在要求、方向、动力以及新趋势等方面都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从“公共性”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选取韩国和中国等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为研究样本，审视二战后两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公共性危机及其给社会带来的种种结构性问题，认为当代东亚公共性的逻辑应遵循一种从“对抗性公共性”转换为“均衡性公共性”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即强调在“国家—市场—社会”的框架下，诸如民族国家、公民团体、政治团体、工会团体、民众、社会阶层等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二元式的对抗性、矛盾性和对立性关系，应积极倡导运用正反消融、和谐融通的东方智慧，建构一种既保障主体性权益又保持相互之间的对话理解甚至宽恕的关系，这本身也是一种均衡性公共性的实质所在。“均衡性公共性”的建构将会成为东亚新发展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也会成为东亚现代性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

| Abstract |

Building around basic questions like “how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society of East Asia is influencing publicity transition” and “what kind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s are needed to support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select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of South Korea, which is less concerned by Chinese sociologist, as research object, this book digs into the logic of South Korea’s Publicity Transition behind it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hich may b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rame to see East Asia’s modernization dilemma and new choices.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is to go beyond existing Korean studies which focus on regional economy, polit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raditionally regarding western countries or Japan as a single reference sample, and to promote the logic behind South Kore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o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ding new soc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east Asia.

Specifically, this book considers that public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e closely connected in regard to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There is a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visibility, openness, integrity, subjectivity, interactivity, balance, life feature of the publicity and the fundamental content, scope, immanent request, direction, impetus, and new trend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chooses China and South Korea, the comma exogenous type modern countries, as a sample project, to see the public crisis and structural problems brought by their soci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of public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book suggests that the pub-

licity of modern East Asia should follow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onverting from the antagonistic publicity to a proportional one, which emphasizes that under the State-Market-Society frame, th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cluding national states, civil groups, political groups, union groups, the populace and social classes should, with using an accommodating oriental wisdom, guarante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orgiveness of each other while safeguarding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instead of being in a binary, confrontation-al, and competing state, as a substance of the proportional publicity.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portional publicity is of great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which is going to be the core theory and practice content of East Asian new developmentalism,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modernity in social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目录

CONTENTS

导 言	1
一 本书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意义	1
二 公共性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	5
三 韩国社会的公共性危机与社会发展反思	16
四 东亚社会发展的“韩国视角”及其独特性	25
五 对中国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的有益启示	29

第一篇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性 危机及其社会后果

第一章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次公共性危机	37
一 政府主导的压缩式现代化：韩国社会自主空间扩大的外在 推动力	37
二 韩国的第一次公共性危机与公民社会发展	40
三 国家与社会的“双缺失”与第二次公共性危机	49

第二章 公共性危机与青年“工作贫困”的社会风险 66

- 一 “工作贫困”释义与内在逻辑 66
- 二 国家公共性弱化与韩国的新型贫困 68
- 三 贫困的蔓延：青年工作贫困的结构性特征 73
- 四 青年“工作贫困”衍生的社会风险 76
- 五 公共性何以可能：对中国的有益启示 82

第三章 公共性危机与“房地产阶级社会” 87

- 一 韩国快速工业化进程中房地产发展的规律与逻辑 87
- 二 “房地产阶级社会”的形成与阶层定型化社会 89
- 三 “国家公共性的回归”与房地产阶级社会的治理良策 91
- 四 “房地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意义 92
- 五 对中国的有益启示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95

第二篇 韩国社会发展的反思与公共性重建

第四章 发展主体的反思与“东亚”的回归 105

- 一 近现代韩国的东亚意识 105
- 二 “东亚的回归”与发展的反思 108
- 三 韩国学术界内部关于“东亚论”的争论与回应 117
- 四 东亚视角的再认识：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 120

第五章 东亚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124

第六章 公共性的东亚比较与均衡式公共性探索 131

- 一 东亚三国的公共性差异 131

二 韩国“均衡式公共性”的探索	133
第七章 公共性的“日常生活视角”与底层的真实表述	
——以韩国经济增长时期的底层女工为例	138
一 韩国的女性工人与快速现代化	139
二 寻找真实的工人：“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反思性意义 ..	140
三 女工日常生活文化与阶级认同	146
四 底层的真实叙述与底层研究	150
五 结语	153
第八章 东亚新发展主义与公共性的宽恕意识	154
一 从“东亚模式”到“东亚新发展主义”	154
二 东亚新发展主义与公共性的宽恕意识	156
✓	
 第三篇 中国社会的相同困境与公共性重建	
 第九章 工作贫困与公共性的中国式反思	166
一 中国“工作贫困”趋势	166
二 “工作贫困”的治理与内在逻辑	171
三 “工作贫困”的中国式解读与反思	173
 第十章 东北老工业基地棚户区的形成与公共性危机	179
一 棚户区释义与公共性逻辑	180
二 边缘区域的改造与公共性构建	182
三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棚户区化”过程与“公私两无”困境	187
四 均衡性公共性与实践模式	190